

评完奖，作品就成了摆设

如果不评奖，对于老顾，以及与他经常合作的某文艺协会主席老李来说，那意味着少了一个赚钱最快的渠道。“评奖成了一个大红包。”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说，“有钱的人，有权力的人，都动起来了。”

回想过去的时光，老李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。当初文艺协会联合企业办一个比赛，评审都是自己的人，每次当评委，能拿到3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报酬，这笔钱从企业冠名费中抽取。

而能评上官方参与设立的奖项，文艺工作者们也赚足了面子。孙立生回忆，曾经有位画家取得了某个协会的奖项以后，原来一幅作品的价格直接上涨了一倍。还有位作家，曾经找到山东群众文化学会副秘书长，请他帮忙卖5000册书，后来这本书获了茅盾文学奖，紧接着就销售一空。

当时还有一个号称唱歌能治病的女歌手，甚至力压华语一姐，获得了最受欢迎奖。山东音乐学院副教授李如春透露，有的民间音乐大奖，就是几个大公司商议一下，共同选出今年要推的艺人，然后一人分一个奖。

评奖，成为一个利益争夺的工具。



湖北作协主席方方曾多次痛批文艺评奖过程中不正之风。(资料片)



鲁迅文学奖和鲁迅文学艺术奖不是一回事。“落马”官员、佛山市政协副主席廖东明曾是第九届广东鲁迅文学艺术奖得主。(资料片)

只要名头响亮，老李根本不愁没有参与者。而跟老李有同样想法的人和机构还有很多，基本上每个行会、协会都有评奖，甚至有些全国奖都在区一级组织评审。平日里，有很多协会成员主动找上老李，想在协会拿个奖。孙立生回忆，有些曲艺奖项，最后都是颁给了自己人。比如走出落马官员的鲁迅文学艺术奖，还有不少获奖者是作家协会的成员。

现在，老李觉得，如果奖项减少，就会少了很多暗箱操作，有限的奖项不可能满足有需要的人们，无论领了谁的人情，都会得罪其他人。还是交给评委，凭实力说话，是最稳妥的办法。

曾经常作为评委的孙晓，如今只想坐在书桌旁，安心地阅读参赛者的稿件，他觉得这样才是文艺工作者想要的比赛。而不是因为奖项繁多，只能留给评委一点匆忙评选的时间。他说，有次评选广播剧，甚至只能听完第一集，几天时间就看完一大摞小说，有的评委只看看标题和简介，就写下意见。还有一个电影评委，评完奖大汗淋漓，一共评出200多个奖，因为哪方利益都需要顾及。

而老李通过朋友认识的文化传播公司的小刘，最近也在发愁，他在考虑，奖项减少了，以后要不要发动所有员工，出去寻找企业洽谈做企业文化的生意。由于老李跟企业打交道少，办比赛的工作就外包给小刘，通过他的关系与企业合作，最后费用平分。而最让小刘赚钱的，是接到政府外包给他的“制作费”，做成有关部门需要的作品，让政府部门参与评选。比如曾经接到一个主旋律微电影的拍摄，反映某建委的业绩。很多片子评完奖，也就成了摆设。

孙立生很为这种“浪费”痛心，因为评奖的作品和给老百姓看的作品，往往是不一样的，作品获奖后被白白扔掉，是常有的事情。由于评奖所带来的利益，评委的喜好常常会成为创作的方向。“艺术没有标准来衡量。”孙立生说，文艺创作的题材是长期积累，偶然得之，就像是遇到恋人一样，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。但参照物变成获奖了，评奖市场越来越大，把艺术本质长期积累偶然得之的规律彻底打乱了。有的奖项要求的时间很短，作品成了“急就章”。而现在，评奖减少，作品似乎也在渐渐回归。

孙立生觉得，文艺工作者们应该借此深入到民众之中，了解他们的生活，写出接地气的作品。因为奖项的减少，“急就章”失去了市场，文艺工作者们就会安心创作。说不定，一些民间小调也会重新发展起来，而不是因为他们无法登上主旋律大奖的舞台，长期受到忽视。

但老李开始担心，之前获的奖项被撤销了，会不会让曾经的获奖者觉得手中的奖也贬值了，如同一个引以为傲出身名校的学生，母校突然被取消的感觉一样。孙立生却认为这是好事，时间久了，留存奖项的含金量就越来越高，而不是奖项决定了作品的走向。

大红包飘走了，一切渐渐按部就班，然而真的是这样吗？

奖没了，文艺还要“活”下去

“奖不是重要的，要看奖背后是什么？”方方说，“奖项后面政府介入太深，政府介入后，把住房、职称、工资全部和奖项挂上钩。经常唯一化，就是你拿到一个奖，不管你这个人好不好，水平高不高，都无所谓。”

老李担心，托关系的人不会因为奖项的减少而减少，反而数额会越来越大，因为奖项缩减，大家一窝蜂地去争夺仅存的奖项，竞争越来越大。对他们而言，当奖与太多东西挂钩时，奖意味着职位、未来和前途。

当一位艺术家再一次向某省宣传部提出，我们的作品缺点是“高大全”时，宣传部的领导像往常一样摇摇头，说“没办法，奖就只会颁给这样的作品”。

孙晓记得，在有些城市，作者获得一个国家级文艺大奖，政府会奖励一套房子。不为别的，因为这是政绩的体现。所以，一个事业单位的编辑最近辞了职，他与同事所编辑的一整套丛书，最后却署上了领导的名字。他们所获得的费用，甚至还不如一个领导所谓的“评审费”高。他们的辛苦，被变成了上级的政绩。

“评价体制改变不了，奖项依旧是追逐的目标。”老李笑笑说。

艾君并没有觉得文艺评奖的删减，会带来太多的改变，虽然增加了竞争力，对提高品质扩大某一奖项的社会影响力有利，但如果不能制定科学的合理标准，加强科学监督和管理机制，利益链条的强度就会加强，长度就会延伸，对打破这种利益格局难以有实际作用。“就像是一个人患病了，不能像西医治病那样对具体病下药或治疗，而要像中医进行各部位系统综合分析和调理。”

老李明白，只要有利益的需求，就难保暗箱操作的产生。他不敢说，如果真的有事关自己前途命运的人找来，他还会拒绝吗？毕竟获奖成为硬杠杠的同时，评奖的监督机制还没有完善起来。

老李有时候也会想，把奖都取消了多好，也没了那么多烦心事。但同时，他又止住了这个念头，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标杆、一种鼓励，当然，前提是能回归原来本质的话。

“奖不是问题，关键在于你怎么看。”方方说，如果是一种鼓励，不带有任何政府的介入和利益的挂钩，那么多少也无所谓。“奖应该就像是过年一样，喜庆一下，但是年过去了，日子还照常过。”

她说，就像没有诺贝尔奖，莫言也会一直写下去一样。



湖南卫视再无湖南

本报记者 徐瀚云

“今天湖南大雨……”5月8日中午，湖南卫视主持人杜海涛发了一条简短的微博，悼念《快乐大本营》制作人胡南。胡南于2015年5月5日晚因病去世，年仅40岁。《快乐大本营》的幕后从此再也见不到这位曾带给人们无限欢乐的女制作人了。

5月7日，李湘在微博中写道，“翻看朋友圈，你还在……就像从来没有离开过……亲爱的，在天堂好好照顾自己。”电视导演汤浩也在微博里写道，“一路走好，才女胡南，我的入门老师、好搭档、好朋友。天堂里没有病痛，你会是开心的天使。”

我们并不熟悉胡南，作为幕后工作者，她注定不会像台上的主持人那样闪耀。胡南生于1975年，是芒果台有名的才女，曾担任湖南经济广播电台主持人，湖南都市频道音乐节目制作人。

2003年后，胡南开始致力于引进国外先进的电视节目模式，参与多个影响很大的节目本土化改造。大家熟悉的《快乐大本营》中的“科学实验站”、真人秀《极速前进》、明星亲子益智历险闯关节目《疯狂的麦咭》都是胡南参与从海外引进的节目。

作为一名电视制作人，胡南经历过湖南台最为艰苦的岁月，在一步步前行中，她的成熟和能力为人所有目共睹，她参与导演和制作的节目给观众带来了无限的欢乐。

无论加入团队，还是自己带领团队，再或者是自己组建团队，胡南一直都处于“创业阶段”、“创业状态”。因此，她永远忙到马不停蹄。也因为太忙，恋爱常常花开无果，最后也就一直没有成家，也一直没有孩子。还因为太忙，她最终住进了医院，告别了这个世界。一向以女强人形象示人的胡南，离世时无家无子，孑然一身，叫人心酸。

湖南台副总编辑周石兴发文悼念胡南，他这样写道：如果有来生，你再也不要问有什么意义，你要记住，活着，就是意义；如果有来生，你再也不要问，你最好的作品是什么，你要知道，你最好的作品就是你自己；如果有来生，你不要这么出类拔萃，不要这样争强好胜，不要这样追求完美。

胡南生前，有人劝她，如果有来生，就做一个平平安安的女儿，就做一个平平庸庸的朋友，就做一个平平凡凡的常人。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卓绝的风华而呵护你，不会因为你天纵的才情而怜惜你，不会因为你高贵的心性而珍爱你。你的存在，才是这个世界的价值所在。